从附属者到历史主体：美国学界华人妇女史研究述评*

冉琰杰

摘要：美国华人妇女的历史曾长期被美国学界忽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围绕《佩奇法》的研究，将华人妇女确立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叉性理论、跨国主义视角、身份政治进一步推动华人妇女多元身份与角色的叙事探索。然而，当“主体性”成为华人妇女研究的新范式，对妇女历史经验的解释可能面临新的简化风险。中国学界可通过挖掘侨乡民间文献与运用跨国比较视野，超越以西方学术为中心的理论预设，为国际妇女移民研究贡献中国视角。文章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第二次妇女运动以来美国学者发表及出版的涉及华人妇女史的代表性论著进行评析，梳理其研究的发展路径，为中国学界进一步展开国际妇女移民的研究提供对话基础。

关键词：美国学界；华人妇女；身份政治；主体性；中国视角

作者冉琰杰，五邑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社会史、妇女史、华侨华人与侨乡。地址：江门市，邮编529000。

一、引言

在近期美国史学界，“身份政治”深刻重塑了历史研究的格局，学者从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群体的立场出发，通过不同的角度探究各个身份群体的经历，身份群体史学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主流之一[①]。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有关2024年世界移民数据，中国是继墨西哥和印度之后美国第三大移民来源国[②]。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悠久，华人移民构成美国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经验值得深入研究。而华人妇女作为这一重要移民群体中的“双重边缘”群体（种族上的少数族裔与性别上的弱势群体）[③]，对她们的研究属于美国妇女史与移民史的交叉领域，其研究范式的发展轨迹印证了社会运动、身份政治对美国史学的影响。

目前，中国学界对美国学界华人妇女史研究之学术脉络的认识尚不清晰，对这一兼具方法论创新与现实意义的学术领域缺乏系统梳理的成果[④]。基于此，本文旨在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第二次妇女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五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专项项目（QYGB2503）成果。

①李剑鸣：《身份政治与美国史学的新趋向》，《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② World Migration Report：International migrants：numbers and trends，https://worldmigrationreport.iom.int/what-we-do/world-migration-report-2024-chapter-2/international-migrants-numbers-and-trends.

③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身份的中国女性移民及其女性后裔，美国学者有Chinese Women，Chinese immigrant women，Chinese American women的不同表述，虽然妇女“身份”是值得解构的学术研究议题，但仅为了便利梳理学术史，行文中会用“华人妇女”来统称以上英文表述。若涉及华人妇女的特殊身份，则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身份而做对应的指称。

④令狐萍：《美国华裔妇女的研究及其方法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1年第9期。文中学术史梳理出自其本人著作《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此外，倪婷：《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美国妇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原祖杰，武玉红《从“姐妹情谊”到“女性差异”——美国女性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雷博云：《美国早期妇女政治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以上学者的三篇文章较好地梳理了美国妇女史，但是内容均缺少美国妇女史中华人妇女史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运动以来美国学者发表及出版的涉及华人妇女史的代表性论著进行评析，考察华人妇女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华人妇女曾经只是华人男性移民故事里的配角；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华人妇女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90年代以来学者逐渐使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视角分析华人妇女的婚姻家庭和社会融入情况；受身份和政治因素影响，更多的研究强调华人妇女的多元角色和身份认同。这些研究范式的变化不只有积极创新的一面，也带来了新的局限。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学界华人妇女史研究的学术史，以期为中国学界理解当代美国史学提供来自移民与性别的视角，更希望助益中国学界思考如何立足本土史料，超越西方理论预设，做出更有深度的移民妇女史研究。

二、从附属者到独立的研究对象

美国妇女史长期以来被美国史学界所忽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以及社会学科自身发展的推动下，妇女史研究才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的学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将工人、移民和黑人中的女性纳入研究视野，并借助行为科学分析模式考察家庭、社区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国大学里的华裔师生受民权运动、族裔研究的影响，正在推动美国华人研究向处于主流地位的欧洲中心学术传统发起挑战，1969年旧金山州立大学成立美国华人研究机构，这象征着美国华人研究进入新的局面，从极少数学者的个人兴趣转变为有科研组织支撑的学术研究领域[②]。

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性主义中“姐妹情谊”的普世化叙事，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验等同于所有女性的经历，导致少数族裔妇女的种族与阶级差异被忽略[③]。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中国女性移民和华裔妇女的生活被双重简化：一方面她们的历史经验被纳入普世化的女性叙事框架，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旅居者（sojourner）理论”固化于华人男性移民的附属叙述中。“旅居者理论”将19世纪华人移民社区女性稀少的现象，武断归因于中国男性移民的侨居心态和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进而将华人妇女视作社会的边缘人物[④]。这种刻板印象既否定了华人妇女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也掩盖了移居国制度性排斥华人妇女的事实。

1968年，Stanford M. Lyman关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华人移民婚姻与家庭结构的研究，呈现华人移民史领域学术范式的过渡性特征。Lyman一方面沿用“旅居者理论”表达因性别比失衡、法律限制和文化传统导致的单身男性主导的华人社区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他的目光涉及普通华人移民的妻子，指出中国习俗要求妻子生活在夫家，男性出外谋生，因此早期主要是男性往外流动，而美国排华法律又加剧了华人夫妻跨国分离的状态[⑤]。这一分析虽然仍从男性视角出发，但是点出了美国排华政策对华人妇女的影响，而且将“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引入华人移民史研究中，为后续华人家庭、华人妇女研究奠定了学术对话的基础。

华人妇女史研究的第一次范式突破出现在对《佩奇法》时期中国女性移民的研究中。Lucie Cheng Hirata（成露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指出《佩奇法》表面上旨在打击华人妇女的卖淫活动，实则相关执行过程中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官员腐败导致贩卖妇女的成本上升，而进一步将华人妇女视作商品[⑥]。George

---

①倪婷：《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美国妇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②谭雅伦，万晓宏：《美国华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八桂侨刊》2001年第2期。

③原祖杰，武玉红：《从“姐妹情谊”到“女性差异”——美国女性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

④George Anthony Peffer, *From under the Sojourner's Shadow: A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of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to America, 1852-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Spring, 1992, Vol. 11, No. 3, pp.41-67.

⑤Stanford M. Lyma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to America, 1850-1960. Phylon*, Vol. 29, No. 4 (4th Qtr., 1968), pp. 321-330.

⑥Lucie Cheng Hirata, *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igns*, Autumn, 1979, Vol. 5, No. 1, pp. 3-2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hony Peffer通过分析19世纪中后期美国驻香港三位领事的档案和移民统计数据，批判了Mary Coolidge等前辈学者的“旅居者理论”解释框架，他认为《佩奇法》是加剧唐人街男性华人“无家庭生活”问题的关键因素。他还敏锐地发现华商妻子与劳工女性入境美国的差异：1875—1882年间，华人妇女移民总数下降68%，但是华商妻子比例相对稳定，而劳工女性数量锐减[①]。这一论据提醒学界注意区分华人妇女身份地位的差异，清末入境美国的华人妇女群体并非只有单一身份。上述两位学者都从法律文本与实践层面分析影响华人妇女入境美国的因素，共同推动华人妇女史实现第一次范式突破，将华人妇女从华人男性移民的叙事背景中剥离出来，使华人妇女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的转型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浪潮之间形成了张力，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对少数族裔产生了不利影响，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抗衡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②]。同时，随着妇女运动的内部分化，少数族裔女权理论兴起，催生了亚裔女性的性别意识发展和种族身份认同[③]。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史学界借助新的“政治定义”挖掘女性的政治参与行动、创建新的美国早期妇女政治史研究领域的关键时期[④]。此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史转向深刻影响了华人妇女史的书写，促使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凸显华人妇女“压迫—反抗”的主体性叙事。Stacey G.H. Yap对波士顿唐人街32名华裔妇女的研究显示，这些女性在传统的亲缘网络之外构建了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调动各种资源服务华人社区，反抗来自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⑤]。David Beesley考察1850—192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县华人妇女及其家庭在经济剥削、法律排斥与种族暴力的压迫下，如何通过务农、做生意等方式在当地扎根，如何逐步从旅居者转变为定居者[⑥]。Peggy Pascoe关于1874—1939年美国教会婚姻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将传教士机构视为华人妇女“拯救者”的叙事框架，而将传教士机构视为种族化性别权力的斗争场所。研究指出，华人妇女在中美两种性别规范的夹缝中，并非被动接受哪一种，而是有自主选择性，利用教会救助以争取有利婚姻的条件与自主空间[⑦]。这类研究都关注了某一特定共同体中妇女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将华人妇女形象从负面的被动受害者塑造成积极的策略性抗争者，强调华人妇女的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Stacey G.H. Yap既是外部观察者，也是华裔妇女中的一员，这种“双视角”的叙事背后，离不开其身份政治因素对研究立场的影响。此后，由华人女性学者书写、彰显华人妇女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历史研究不断增多。

总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华人妇女史的研究经历了重要的转变。早期的研究受“旅居者理论”影响，往往只在讨论华人移民的策略、入境美国的华人性别比率、唐人街“单身”男性时简单兼论华人妇女。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围绕《佩奇法》的研究，将华人妇女确立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揭示了法律制度如何排斥不同身份的华人妇女群体。同时，其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打破了华人妇女作为被动受压迫者的刻板印象，关注她们如何调适中西文化冲突、在美国结婚工作、融入美国社会。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例如依赖官方档案和统计数据，尚未充分呈现美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华人妇女生活的多样性。不过，除了史料学方法，运用社会调研、访谈法挖掘女性个体经验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这些先行研

---

①George Anthony Peffer，*Forbidden Families：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1875-1882，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Vol.6，No. 1，（Fall 1986）pp. 28-46.

②原祖杰，武玉红：《从“姐妹情谊”到“女性差异”——美国女性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

③Esther Ngan-Ling Chow，*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Asian American Women，Gender and Society*，Sep，1987，Vol. 1，No. 3，pp.284-299.

④雷博云：《美国早期妇女政治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

⑤Stacey G.H. Yap，*Gather your strength，sisters ：the emerging role of Chinese women community workers*，Bosto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Doctoral Dissertation，1983.（这本博士论文于1989年出版）

⑥David Beesley，*From Chinese to Chinese American：Chinese Women & Families in a Sierra Nevada Town，California History*，Sep，1988，Vol. 67，No. 3，pp. 168-179.

⑦Peggy Pascoe，*Gender Systems in Conflict：The Marriages of Mission-Educated Chinese American Women，1874-1939,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Summer，1989，Vol. 22，No.4，pp. 631-65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究使华人妇女走出历史书写的边缘，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并奠定了该领域的方法论基础。

三、交叉性与跨国视角的引入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开始关注美国华人妇女的主体性，但大多陷入“压迫—抵抗”的二元叙事框架，忽视华人妇女群体的复杂性和不同时期性别观念的结构性嬗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叉性理论和跨国主义视角的引入，推动了华人妇女史研究走向更丰富的分析层次。

交叉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民权运动推动下对社会性别理论的一种发展，同时也是在反思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对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范畴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分析，强调不同的权力结构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个体的处境[①]。Sucheng Chan（陈素贞）较早将交叉性理论运用于排华法律的分析，她指出《佩奇法》和美国的排华法案并非排斥所有华人妇女，而是依据华人妇女的阶级身份进行“分别”排斥，例如华商妻子有入境美国的机会，而劳工妇女则被拒之门外。这一分析揭示了美国政府排华政策背后，有出于道德准则、种族和阶级的多重考量因素。陈素贞更尝试构建连接微观群体经验与宏观制度结构的方法论桥梁，正如她所强调的，只有全面审视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政治与私人领域中的家庭组建、子女养育以及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的相互作用，才能全面理解美国华人妇女的历史[②]。她的思路呼应了同时期美国女性主义者“个人的即政治的”命题，也呼应了美国妇女史学者希望彻底打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壁垒，将日常生活与公共政治互相结合的学术理念[③]。

Judy Yung（谭碧芳）在史料发掘上有所突破，她分析20世纪初旧金山《中西日报》对缠足、纳妾、包办婚姻和蓄婢的批判[④]。随后她意识到报纸的批判性话语未必反映普通妇女的真实生活，于是更多地投入华人妇女生活经验的研究，以口述史的方式为美国华裔妇女发声[⑤]。1995年她出版了旧金山华人妇女史研究的专著，书中运用交叉性理论探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旧金山不同代际的华人妇女如何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下，适应美国主流社会，实现自我价值[⑥]。令狐萍进一步把研究视野从旧金山华人妇女扩大到19世纪以来的美国华人妇女，指出早期华人妇女的身份和职业选择受移民政策、种族及性别歧视的影响，二战后华人妇女数量逐渐增长，她们在华人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积极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新种族”[⑦]。两位学者的叙事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代际华人妇女的主体性，也注意到美国社会区别对待白人与其他种族，限制少数族裔权利的历史持续性。

鲍晓兰和Margaret M. Chin（陈美璋）都运用交叉性理论探讨了纽约制衣业的华人女工。鲍晓兰分析女工在资本剥削、工会性别歧视与移民政策壁垒压迫下的性别角色，她们“顶起大半边天”[⑧]。陈美璋对比韩

---

①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②Sucheng Chan，*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Women，1870–1943，in Entry Denied：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1882–1943*，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94–146.

③雷博云：《美国早期妇女政治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

④Judy Yung，*The Social Awakening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s Reported in Chung Sai Yat Po，1900–1911，in Unequal Sisters：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S. Women's History*，edited by Ellen Carol DuBois and Vicki L. Ruiz，New York：Routledge，1990，pp.195–207.

⑤Judy Yung，*Giving Voice to Chinese American Women. 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1998，Vol. 19，No. 3，pp. 130–156.

⑥Judy Yung，*Unbound Feet：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⑦Huping Ling，*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A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Liv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这本书的中译本《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增订版由中国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⑧[美]鲍晓兰著，马元曦等译：《顶起大半边天：纽约市的华人服装女工1948—199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英文原版于2001年出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裔制衣厂与华裔制衣厂老板的招聘条件和工人的工作条件，分析新移民身份、家庭状况、种族关系和性别因素如何交叉影响美国制衣业的发展环境、雇主的招工意向以及女工的工资福利[①]。她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21世纪纽约唐人街制衣业衰落，华裔女性转向其他行业，但制衣业遗留下来的财产依然存在[②]。这类对特定社区同一身份群体的历时性研究，拓宽了华人妇女史的研究视野。

如果说交叉性理论关注到华人妇女的多重身份，以及法律、政策、经济、文化规范等相互交织的因素对华人妇女的影响，这些超越了简单的“压迫—反抗”二元分析框架，那么跨国主义视角则是把华人妇女视为跨太平洋的移民关系网中的成员，突破了国家边界的分析限制。Adam McKeown批判“国家中心视角”，主张将移民理解为一种循环而非单向的迁徙。基于这一跨国视角，他修正了以往学界的观点：排华的法律虽然限制华人进入美国本土，但移民的困难对女性和男性来说都一样，法律并非直接影响华人妇女移民的因素，华人妇女移民和定居的动态变化，更多与华人对举家迁移以及女性移民态度的转变有关[③]。这一分析超越了传统的“旅居者理论”叙事，将华人妇女置于更复杂的跨国社会关系网络中，从而理解她们的移民现象，这代表移民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新突破。

Michael Szonyi（宋怡明）和Madeline Yuan-yin Hsu（徐元音）进一步运用中文的侨汇档案和侨乡报刊，呈现跨国家庭的运作方式。宋怡明指出，海外华人男性移民与家乡的家庭成员保持紧密联系，这种跨国家庭结构使得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更加复杂，男性移民仍然需要为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承担责任，而留守在侨乡的妻子则负责管理家庭财产和维持家庭声誉[④]。徐元音通过分析移民美国的广东台山人与家乡的跨国联系，揭示美国排华法律和经济条件如何造成“split-households”家庭模式，但是许多台山人的跨国家庭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台山妇女依靠丈夫的侨汇生活，维持婚姻关系，家庭被视为经济实体，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她的观点挑战了以往美国移民史研究中将同化与保持传统文化视为二元对立的假设，提出移民的归属感可以跨越国界同时存在，这些移民既在移居国扎根，也对故乡有归属感[⑤]。Marlon K. Hom（谭雅伦）通过解读近代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流传的粤讴“金山歌谣”，观察中国侨乡侨眷妇女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世界[⑥]。三位学者运用不同的材料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侨乡华侨家庭妇女形象的研究。这些妇女不是被动地受移民政策排斥的受苦者，而是跨国家庭的维系者，这类研究也突显了中国本土史料对理解美国华人移民经验的重要性。

交叉性理论与跨国主义视角超越了“旅居者理论”“国家中心视角”以及妇女“压迫—反抗”的静态解释框架，丰富了华人妇女史的叙事。但需要警惕的是，交叉性理论诞生于美国黑人女权运动浪潮，学者在声称运用“交叉性”作为分析工具时缺乏统一标准，而分析的结论都彰显华人妇女的主体性，这似乎走向另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即塑造华人妇女在各种逆境中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将华人妇女经验普遍“积极化”的倾向，容易消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

①Margaret M. Chin，*Sewing Women：Immigrants and the New York City Garment Indust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②Margaret M. Chin，*The Backbone of New York City's Chinatown：Chinese Women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1950-2009，in Our Voices，Our Histories：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Women*，edited by Shirley Hune and Gail M. Nomur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20，pp.238-253.

③Adam McKeown，*Transnational Chinese Families and Chinese Exclusion，1875-1943*，*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Winter，1999，Vol. 18，No. 2，pp. 73-110.

④Michael Szonyi，Mothers，*Sons and Lovers：Fidelity and Frugalit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Divided Family Before 1949*，*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Volume 1，Number 1，May 2005，pp. 43-64.

⑤Madeline Yuan-yin Hsu，*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1882-1943*，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本书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2001年度历史著作奖）

⑥Marlon K. Hom，*Rhymes Cantonese Mother Sang，in Chinese America：History and Perspective*，1999，pp. 62-70；谭雅伦：《弱群心声：“出洋子弟勿相配”——珠三角侨乡歌谣中的出洋传统与家庭意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四、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多元叙事

20世纪末以来，身份政治作为美国一种新的政治现象，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史学界的重要研究范式。身份政治主要指那些因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长期遭受歧视与排斥的边缘群体，由于他（她）们发展出强烈的身份意识，进而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动员，要求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在美国史学领域，关于黑人、奴隶制、妇女和其他底层群体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不仅各身份群体的经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史学研究也为各身份群体的身份意识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史学研究已然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①]。华人妇女史研究同样受此学术潮流影响，除了交叉性理论的运用，学者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不同身份华人妇女丰富多样的历史经验，分析她们的身份认同，探讨她们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作用。

Hua Liang（梁华）解读中英文报刊史料，展示20世纪上半叶纽约华人妇女如何通过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爱国会、新生活运动协会的各类活动，突破为妻为母的角色，在公共领域构建出双重认同——既关注自身在美国社会的融入，也把祖籍国灾民救济和抗日救亡运动视为己任[②]。Zhou Min（周敏）结合社会学定量研究、实地调研和性别研究等跨学科方法，探讨了20世纪后期华人妇女的移民动机、职业特征及其性别角色，指出华人妇女是支撑纽约唐人街经济的半边天，而纽约唐人街作为华人“飞地”，既为妇女提供了就业庇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③]。陈素贞研究第二代美国华裔的自传，分析华裔的自我认同，指出华裔女性普遍抗拒传统性别角色，追求在教育、职业、择偶方面的自由选择权，由此引发家庭代际冲突[④]。Phonshia Nie 则展示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1876—1965）时期美国南方浸信会华裔女基督徒如何应对白人至上主义、基督教伦理、性别规范的制约，同时回应自身对阶级流动的需求，在复杂博弈中进行人生选择，形成独特的生活经历[⑤]。这些研究没有机械运用交叉性理论，而是吸收社会科学多种研究方法，挖掘不同类型的史料，更细致地考察历史脉络里华人妇女身份政治的复杂性。研究共同表明，华人妇女的主体性是在文化冲突、制度限制与家庭期待的张力中被建构的。

面对美国排华法律的极端导向，华人妇女生存本身即是一种抵抗。Jean Pfaelzer把排华比喻成一场持久的战争，华人妇女通过逃亡、诉讼和劳动顽强生存的行为，就是无声的政治抵抗[⑥]。赵小建从制度史和社会文化史角度揭示华人（以华人妇女为核心主体）如何通过诉讼、游说、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开展长期维权斗争，争取家庭团聚权利。二战后“战争新娘”的大量涌入，使华人社区从“光棍型”转变为“家庭型”，这些女性新移民需要重建夫妻关系，适应美国文化，面对社会歧视，她们在多重压力下定义自我角色[⑦]。

Mae Ngai（艾明如）眼光独到地关注到美国第一批华人中产阶级的形成，她认为排华时期的华人并非先“克服障碍”再“融入白人社会”，华人中产阶级是生存在夹层中的人（夹在白人与底层华人之间），也是文化中间人。她以泰普家庭的故事为例，家庭的女性——挑战学校种族隔离的母亲玛丽，投身民权运动的女儿

---

①李剑鸣：《身份政治与美国史学的新趋向》，《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②Hua Liang，*Fighting for a New Life：Social and Patriotic Activism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1900 to 1945*，*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Winter，1998，Vol. 17，No. 2，pp.22-38.

③Zhou Min，*Chinatown：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④K. Scott Wong，Sucheng Chan，*Race，Ethnic Culture，and Gend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among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in Claiming America：Construct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ies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7-164.

⑤Shirley Hune，Gail M.，*Stretching the Boundaries of Christian Respectability，Race，and Gender during Jim Crow：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 Southern Baptist Church，in Our Voices，Our Histories：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Wome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20，pp. 87-105.

⑥[美]琼·菲尔泽著，何道宽译：《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⑦赵小建：《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英文原版获亚美研究协会2003年度历史著作奖）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玛米，曾在陆军妇女军团服役且活跃于社区的儿媳鲁比——展现出兼具文化中介性与身份意识自觉的现代精神[①]。即便在民权运动之后，华裔中产阶级妇女增多，但是她们的政治参与仍然面临制度性障碍。Sue Fawn Chung（张素芳）分析美国内华达州Lilly Fong和Cheryl Lau的从政经历，指出两人在政治上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个人能力或竞选策略，其中更反映主流政治体系对少数族裔女性领导力的低估，可见华裔女性从政之路困难重重[②]。

文化场域也是华人妇女通过展示女性气质进而表达身份政治的重要空间。Kathleen S. Yep通过口述历史方法，考察20世纪30—4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工人家庭出身的女篮球运动员如何以身体力量、速度与韧性挑战亚裔女性柔顺气质的性别刻板印象[③]。Mana Hayakawa也运用口述访谈，研究20世纪30—6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夜总会亚裔女舞者，虽然她们以“东方异域”形象为噱头，但表演融合东方元素与美国舞蹈，挑战了美国社会关于亚裔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而且祖籍为中、日、菲的亚裔女舞者建立了跨种族的友谊，她们分享相似的被歧视经历，以及代际文化转型的经验，以应对种族、性别、性与公民身份的复杂变迁[④]。

总之，身份政治深刻塑造了华人妇女史的研究面貌，学者通过挖掘华人妇女留下的各种材料，以及运用口述访谈，推动华人妇女从“被书写的对象”转向“历史的言说者”。无论是华人女性基督徒、“战争新娘”、反抗种族隔离的母亲，还是女工人、女运动员、女舞者、女政治家，这些多元形象共同构建了华人妇女史的丰富图景。然而，当身份政治为华人妇女的身份和权利“正名”时，也需要警惕研究的碎片化风险。对中国学界而言，妇女史研究如何既尊重个体经验的多样性，又揭示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个体的生活，这或许是我们走向国际学术对话的起点。

五、反思与展望

近六十年来，美国学界对华人妇女史的研究，经历了从华人男性移民的“附属者”到强调华人妇女“主体性”的研究范式转变，为移民史研究注入了性别视角，为重构美国移民社会的整体图景提供了华人妇女这一块重要的拼图。梳理美国华人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与妇女运动、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深度交织。事实上，西方现代妇女史的发展大体上与同时期的各种社会运动形成合力，妇女运动需要扎实的妇女史成果滋养，而妇女运动各流派的理论也为妇女史研究提供分析工具，并且各种社会运动也培养了兼具政治理想和学术追求的新一代学人，其中不乏女性学者[⑤]。在本文前述作者中，就有多位包括华人在内的美国女性学者，她们是华人妇女史研究的主力军，提出研究问题，发掘华人妇女的主体性，书写华人妇女对家庭和美国社会的贡献，把社会性别视角带进移民史研究，这背后何尝不带有对现实关怀的政治意义？然而，当身份政治将“主体性”与社会运动、少数族群的权益挂钩，当学者执着于证明妇女是否反抗了压迫，历史解释可能陷入新的教条主义。排华法案下的妓女、商人妻子、唐人街小脚妇女、车衣厂女工，侨乡的侨眷妇女，她们的人生经历远非“受苦者”或“反抗者”的标签所能涵盖。

此外，美国学者充分发掘了美国本土史料，包括档案、统计、报刊、回忆录等传统文字史料，以及相关的

---

①[美]艾明如著，高岳译：《幸运之家：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百年传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②Sue Fawn Chung, *Out of the Shadows and into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in the American West*, *California History*, *Winter*, 2020, Vol. 97, No. 4, pp. 56-82.

③Kathleen S. Yep, *Playing Rough and Tough: Chinese American Women Basketball Player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31, No. 1 (2010), pp. 123-141.

④Shirley Hune, Gail M. Nomura, *Stepping Onstage and Breaking Ground: Asian American Dancers Complicate Race and Gender Stereotypes, 1930s-1960s, in Our Voices, Our Histories: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Wom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06-121.

⑤陈雁：《当妇女提问时：新时代的妇女史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口述史史料、影像、图像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受限于语言障碍，仅有极少数学者能够运用中国方面的资料做研究。虽然学者已经关注华人回流现象、华人在移居地与故乡之间建立的跨国网络，但是中国侨乡各地还有大量的地方文献和侨批资料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美国学界基本上是把中国的婚姻习俗、性别文化、父权制家庭当作研究华人移民的固态背景，很少考虑这些因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化，以及变化之后对华人家庭的影响。这些留白，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目前，中国大陆有关移民妇女的研究尚处于学术积累阶段，近年来仅有少数学者有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学术自觉。李明欢较早指出当代国际移民浪潮中呈现“国际移民女性化”的现象，希望引起国内学者重视[①]。沈惠芬深入侨乡调研访谈，挖掘官方及民间各种文字、图像、实物材料，用社会性别理论书写历史中侨乡女性丰富的人生经历[②]。朱骅运用“离散”和“社会资本”理论，对19世纪后期三位美国华人女性（“猪花”）进行个案研究，呈现“猪花”群体的历史样态及其在美国生存的方式[③]。还有学者采用“对话的自我”理论框架，探讨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女性如何对“自我”进行建构[④]。这些研究展示了中国普通妇女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生活智慧，呈现华人妇女在跨国流动中的实际角色。可喜的是，中国学者正通过扎实的史料挖掘与中外比较视野，为国际学界带来新的方法论启示。Fang He（何芳）以女性足部时尚文化的跨国比较为切入点，探讨中美两国在性别秩序、身体规训与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层关联[⑤]。她的研究从跨国与跨太平洋的独特视角出发，为美国学界理解当今中美文化交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因而荣获美国女性历史学家协调委员会颁发的学术奖项。该成就表明，中国历史上妇女的某些生活经验不仅能够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也有可能挑战以西方学术为中心的全球妇女史分析框架。

因此，若未来中国学者致力于推进国际移民妇女研究，需要在理论反思与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在了解国际学界进展的同时，保持独立的学术判断，平衡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与对社会整体脉络的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警惕将复杂历史简化为单一维度的妇女主体性叙事。中国学者的独特贡献，可能更多体现在为国际学界提供来自中国经验的比较视角，为妇女在世界范围的生活经验提供新的解释。

---

①李明欢：《女性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评介》，《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沈惠芬：《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③朱骅：《19世纪北美“猪花”离散群体的社会资本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

④黄玉琴，王丽圆：《跨国社会空间中“对话的自我”——基于一个旅德温州女性的生命叙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

⑤Fang He，*Fashioning female fee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US Cinderellas，Chinese alterity or global beauty?*，*Gender & History*，Vol. 36，No. 2 July 2024，pp. 493-51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nd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Farms: Historical Mirror and Theoretical Field ····· **Li Minghuan(1)**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ommun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otential directions of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s institutional products of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seas Chinese farms have not only undergone the abolition of their original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but have also, over the years, been home to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approximately 210,000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residents.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re not only a historical mirror through which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governance, but also a theoretical field with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The paper also attempts to analyze overseas Chinese farm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three theoretical approache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dependency, and the life-course perspective—with the aim of positioning these gradually historicized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tate, ethnic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s well as a source of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Farms; Historical Mirror; Theoretical Field

From Brief Letters to Deep Affection, from Deeds of Sale to Life Contracts: Written Expressions and Life Experienc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Diaspora Famili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 **Chen Jiajie[Taiwan, China](8)**

Abstract: From the mid-19th to the mid-20th century,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ed distinctive survival strategies amid cross-border mobility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relying on Qiaopi (remittance letters) and deeds of sale (documents recording the sale or transfer of persons) to navigate their lives. As a medium for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exchange, Qiaopi sustained the livelihoods of diasporic families and helped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patrilineal lineages, while revealing the ethical adaptations underlying the adoption of Minglingzi (adopted children). Deeds of sale, meanwhile, documented the re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s under conditions of economic hardship and revealed the power struggles over individual identities between colonial law and customary practices. These two types of vernacular documen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jointly reconstructing the life trajectories of modern diasporic communities amid intertwined ethic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orces. They thus provide crucial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ethics.

Keywords: Qiaopi; Deeds of Sale; Diaspora;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opulation Mobility

From Dependents to Historical Subjects: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 **Ran Yanjie(15)**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long neglected by American scholarship.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cholars' studies of *the Page Act* established Chinese women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of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the 1990s,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identity politics have further encouraged explorations of the diverse identities and roles of Chinese women. However, as "subjectivity" has emerged as a new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women, interpretations of women'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may face new risks of oversimplification. Chinese scholars can move beyond Western-centere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by drawing on vernacular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and adopting a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reby contributing a Chinese perspective to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women and migr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ritically examines representativ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published by American scholars since the U.S. Civil Rights Movement of the 1960s and the Second-wave Feminist Movement,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of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dialogu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migration in Chinese academia.

Keywords: American Scholarship; Chinese Women; Identity Politics; Subjectivity; Chinese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mericans and Indian Americans in Electo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Wang Rui, Wu Jinping(23)**

Abstract: Chinese Americans and Indian Americans are similar in population size and economic status, but their electoral performance differs.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data from the 2016, 2020, and (2023) 2024 U.S. elections, the voter turnout of Chinese Americans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Indian Americans. Chinese Americans had an early start in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nd held an advantage at the local level, but their later development has lacked momentum. In contrast, Indian Americans' influence at both the local and federal levels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and has surpassed that of Chinese Americans. This disparity is mainly due to two factors. First is the intersection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hinese Americans have low voter registration rates because of language barriers and because they tend to live in safe states (states where either Democrats or Republican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